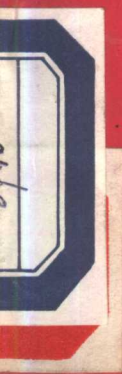


外交巨擘

吕志孔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外交巨擘

吕志孔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外 交 巨 擘

吕志孔

责任编辑 吴正炎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卫生厅青年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5.375印张113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12,044—22,114册

ISBN 7-215-00623-9/K·143

定价2.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系统而概括地，简明而形象地记述了周恩来光照千秋的外交生涯。全书以时间为顺序，采用新闻笔法，追述了周恩来一生中一系列重大的外交活动，诸如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日内瓦和万隆会议，长达15年之久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访问印度、缅甸，非洲十国之行，尼克松、田中访华，中美建交、中日建交，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巧妙而又和谐地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将军事、体育、艺术和外交结合起来，显示了周恩来庄重洒脱、豁达大度的政治家风采，卓越超人、应对裕如的外交才华，体现了新中国特有的外交风格。

目 录

第一章	受命之初	(1)
	中苏友好	(2)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7)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3)
第二章	日内瓦, 话重说	(15)
	针锋相对	(16)
	意外收获	(24)
	殚精竭虑	(27)
	艾登、卓别林、米高扬	(21)
第三章	万隆风云	(34)
	“文仗如武仗”	(34)
	求同存异	(39)
	“和平相处”	(45)
	百尺竿头	(52)
第四章	马拉松式的谈判	(57)
	掌握主动	(58)
	妙棋	(62)
	重要情报	(64)
第五章	睦邻	(70)
	“巴依巴依”	(72)

	胞波·····	(74)
第六章	十万八千里·····	(80)
	寻求友谊·····	(81)
	真正的朋友·····	(84)
第七章	打开中美友好的大门·····	(90)
	信息·····	(91)
	乒乓外交·····	(96)
	“神秘？”·····	(100)
	“跨过了没有交往的25年”·····	(107)
第八章	中日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114)
	“平地起高楼”·····	(114)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118)
	“饮水不忘掘井人”·····	(126)
第九章	久而弥珍·····	(129)
	最后的斗争·····	(129)
	有口皆碑·····	(133)
	独特风格·····	(142)
附 录	周恩来外交大事记·····	(148)

第一章 受命之初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共和国首任总理，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在头十年里，他还兼任外交部长。

周恩来始终是中国对外关系方面举足轻重的人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的问题上，《共同纲领》规定：

“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由于周总理积极贯彻执行上述基本原则，新中国在成立之后，第一年就先后与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东德、阿尔巴尼亚、缅甸、印度、越南、丹麦、瑞典、瑞士、印度尼西亚等十七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此外，还有不少国家表示愿与中国

建立邦交。

中 苏 友 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开始就坚决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并且与苏联建立了最亲密的兄弟关系。

1949年12月16日，建国不到三个月，毛泽东主席便应邀访问苏联。

这是新中国与苏联的第一次最重要的正式外交接触，双方讨论与决定了中苏两国之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次访问对世界形势，特别是远东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随同毛主席访问的有陈伯达、汪东兴、叶子龙、师哲、赛福鼎、邓力群、马寒冰等，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武官边章五，参赞徐介藩、戈宝权等也参加了会议。

在莫斯科，毛主席受到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和苏联人民的隆重而又热情的欢迎。

因为当时新中国刚成立，苏联对中国的情况特别是某些方针政策还有所怀疑，例如，怀疑中国走“南斯拉夫的道路”，会不会执行亲英美的路线等等。所以，一直到后来，苏联方面才谈到双方签订友好条约的问题。

由于签订友好条约是两国政府间的事，毛主席让周恩来总理负责这项工作。

周恩来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后，便积极进行准备，出发之前他就对有关人员说，此行要把中苏的合作往前推进一步，使我国的外交气象一新，取得更好的条件来对付帝国主义。

他着手组织了一个阵容整齐的代表团，成员有李富春、叶季壮、吕东、张东化、赖亚力、伍修权及何谦、沈鸿、苏农官、欧阳钦、柴树藩、程明升、聂春荣、常彦卿等。

1950年1月10日，周总理率领代表团启程。周总理在赴莫斯科的途中同毛主席通了电话，就即将举行的缔结中苏条约的工作交换了意见。在火车上，他还把他准备到达莫斯科时在车站上发表的演说稿交给伍修权事先译成俄文。旅途相当疲乏，可是他却一直在紧张地进行着各种准备工作。

周总理一行于1月20日到达莫斯科。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长维辛斯基，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及王稼祥、陈伯达等到车站迎接。

周总理在车站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他说，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奉毛主席的指示，来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国邦交的会商，以促进两大国之间的友谊团结与世界和平事业。

代表团到达后的第三天，斯大林在维辛斯基的陪同下，接见了周恩来和王稼祥，于是两国的会谈工作很快就开始了。毛主席没有直接参加会谈，由周恩来以外长身分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还有王稼祥、李富春、叶季壮等，白师哲担任翻译。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最初文本是由苏方草拟并提出的，同后来通过并公布的条约虽无原则上的变动，但在文字上却作了很大的修改。周总理直接领导并亲自动手进行修改。他将条约草稿交给代表团成员和大使馆的人员，组织发动大家对草案进行逐条、逐句、逐字的研究、斟酌和修改，他要求人人都开动脑筋，贡献力量。他自己则更是格外认真，精细，一个字一个字的推敲。他说，这个条约不仅要在今天

看行，还要在以后看行不行，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后人检查。条约全文的实质性文字还不到一千字，但是每一个字都经过反复思考。这完全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避免出漏洞。例如条约原文中有一段说，缔约国一方一旦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另一方得以援助。周恩来觉得还不够肯定，没有表明条约的应有的作用，经过再三推敲，将“得以”二字改为“即尽其全力”给予援助。

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隆重的条约签字仪式。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领导人和毛泽东、王稼祥、陈伯达等中国领导人出席了仪式。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代表本国政府分别在两份条约上签字。

条约的核心内容是缔约双方不得参加反对其中一方的任何同盟、集团、行动和其他措施，缔约一方如果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在战争中未受损伤的美帝国主义者正在扶植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苏两国的安全造成了很大威胁。所以，中苏两国作出这样的条约保证，不仅对于缔约双方，对于当时远东及世界形势，也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签字仪式上，周恩来与维辛斯基先后讲了话。周恩来说，缔结中苏条约的根据是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代表了东方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利益，条约的签订使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挑拨中苏两国的企图完全失败了。维辛斯基说，苏中条约表明了两国友谊合作和各国人民和平安全的愿望。

与条约同时签订的，还有《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

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上述条约及协定签字以后，两国又共同声明，1945年8月苏联与中国原国民党政府缔结的各项条约与协定，均失去效力。

当晚，王稼祥大使举行盛大鸡尾酒会，庆祝中苏条约签订和毛主席、周总理访苏成功。斯大林出席了这次酒会，什维尔尼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布琼尼等苏联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及各部部长，各界代表，各国使节共500余人参加酒会。中国代表团全体人员出席作陪。

隔了一天，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又盛宴招待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全体人员。

在两次宴会上，双方不断地互祝两国领袖健康，不断高呼：“中苏友好万岁！”

在会谈期间，中国代表团瞻仰了列宁墓，参观了一些工厂与农庄，还参加了列宁逝世26周年的纪念活动。毛泽东、周恩来还在莫洛托夫陪同下观看了芭蕾舞剧《天鹅湖》。苏联原准备请中国领导人看另一个叫《红罌粟花》的芭蕾舞剧。这是一出以中国革命为题材的作品，但这个舞剧的内容及表现手法却歪曲了中国革命的形象。所以代表团的领导都没有去看，只派师哲等人去看了看，并向苏方提了自己的意见。

2月17日，毛主席、周总理结束了在苏联的访问，同代表团的部分成员一起先期回国。

按条约规定，旅顺、大连的苏军根据地及其财产、设施，应于1952年底以前移交中国。但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经两国商定将移交期限适当延长，驻旅大苏军也暂缓撤出。为此，

1953年2月，周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苏联建军35周年前夕，专程前往旅大市慰问驻在那里的苏联军队。代表团成员海军司令肖劲光，空军司令刘亚楼，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苏驻华大使潘友新也一起前往。慰问期间，周总理还率领慰问团全体成员向苏军烈士塔献了花圈，并为当地苏军庆祝苏联建军节举行了招待宴会。宴会上，苏军一位中尉在翻译周总理的讲话时，有一个地方译错了，被慰问团的一位成员听了出来，当场作了纠正。此事使在场的苏驻军司令大为恼火，他马上走过去，要撕下这位中尉的肩章和领章。宴会厅里一时显得十分紧张。周总理忙上前劝阻说：“两国语言要作到恰到好处的翻译是很不容易的，也可能是我讲的不够完善。”然后，周总理又慢慢地重述了刚才讲的那段话，让翻译仔细听了，圆满无误地翻译出来。周总理讲完话后，在同苏军将领、英雄模范干杯时，特地同翻译单独干杯。苏驻军司令和其他将领看到这一情景，在干杯时，眼里都含着热泪。深受感动的中尉翻译更是举着酒杯久久不放。

在中苏友好的“蜜月”里，1953年3月5日，斯大林不幸逝世。中国立即组成了以周总理为团长的吊唁代表团，3月7日乘专机前往莫斯科，参加对斯大林的追悼活动。这是中国派出的人数最多、代表面最广的吊唁代表团，它包括了党、政、军、工、青、妇以及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科技文化等各界知名人士，其中有李富春、张闻天、罗瑞卿、叶季壮、伍修权、郭沫若、刘长胜、蔡畅、廖承志、章伯钧、李德全、钱俊瑞、钱三强、周立波、张宗逊、王秉璋、罗舜初等。

3月8日，吊唁团抵达莫斯科。当晚，周总理率领吊唁

团和中国驻苏使馆人员一起到工会大厦圆柱厅的斯大林灵柩前献了花圈，并瞻仰了遗容。

3月9日，吊唁团参加了隆重的追悼会和葬礼。

由于斯大林的逝世，对国际国内的许多方面将造成巨大影响，所以，在追悼过程中，人们的心情分外沉重，甚至是惶惑不安的。此时，前来参加葬礼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也突然在莫斯科逝世。中国吊唁团全体成员立即到捷驻苏使馆进行吊唁，接着，周恩来和郭沫若又专程赴布拉格，参加了哥特瓦尔德的葬礼。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纠集了南朝鲜等16国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公开干涉朝鲜内政，武装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战争的第三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借口“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悍然宣布，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同时，下令加强菲律宾的美军，干涉印支战争，形成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在此命令下，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和以各种“顾问团”、“考察团”名义出现的美国武装人员，纷纷进驻台湾；美国远东军司令兼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亲自到台北，与蒋介石密商美蒋“共同防御”台湾，由麦克阿瑟统一指挥台湾蒋军，将逃出大陆的蒋介石集团直接置于美国武装力量的庇护之下。与此同时，美国当权者又制造并散布“台湾地位未定”、“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由联合国考

虑”等谬论，企图使其侵略行径“合法化”。美国政府这一系列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的罪行，激怒了中国人民。

1950年6月28日，周恩来外长就美国总统杜鲁门6月27日的声明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决定以武力阻止台湾的解放，美第七舰队已向台湾沿海出动，这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中国人民必将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7月6日，周恩来外长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指出安理会6月27日关于要求会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的决议是非法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关于以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的声明和美国海军侵入中国台湾沿海的行动是公开的侵略行为。

9月17日，美帝国主义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

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的报告中，周总理严正指出：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

“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现，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

周总理庄重声明：

“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谁要是企图把中国近五万万人口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谁要是抹煞和破坏这四分之一人类的利益而妄想独断地解决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东方问题，那么，谁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当时中美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在关于朝鲜战争问题上，中国同美国政府的一些交涉，是通过与中国已建立外交关系的印度，再由印度通过英国来进行的。

周总理在深夜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要他通过印度总理尼赫鲁转告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向美国政府提出严正警告。新中国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能置之不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

“不能置之不理”——周恩来所用的一字千钧的外交语言，广为世人所传诵。然而美国统治集团对此却作了历史性的错误估计，最后只能自食其果。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带领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很快将麦克阿瑟指挥下的“联合国军”击退。这位当年被捧为太平洋战争英雄的麦克阿瑟将军丢弃汉城，狼狈南逃，因指挥失利受到谴责，后来便被撤职。昔日他曾被人们看作是“不会犯错误”的英雄，然而在失败面前，连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

德雷也不得不承认：麦克阿瑟的战略是“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反对错误的敌人，把我们拖进错误的战争。”

美国侵略朝鲜和占领台湾的严重事件，引起了国际上的严重关注。8月24日，周恩来外长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及秘书长赖伊，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罪行。8月27日，周恩来外长又分别致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及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就美机侵入中国东北领空扫射中国人民事件，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美国则利用联合国进行反扑。

按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规定，安理会在讨论有争端的问题时，应邀请有关的当事国参加讨论。鉴于这一规定，9月29日通过决议，同意由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大和安理会，参加“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讨论，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10月2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正式将这一决定通知中国。

这一决定在当时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尽管新中国已屹立于世界东方，但在美国控制、影响下的联合国，仍企图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中国在联大的正式席位被美国庇护下的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占据着。中国政府早已任命张闻天为常驻联合国代表，却一直未能赴任。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新中国尚不很了解，因此，首次派代表出席联大发表自己的意见，对中国和全世界都有着重大意义。

经过郑重考虑，中国政府决定由伍修权作为特派代表赴联大。周总理找伍修权与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谈了话，确定了此行的方针大计，交代了出国前后的具体任务。10月23日，周恩来外长致电赖伊，通知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业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其他7人为特派代表之助理人员，共9人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提出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电报还开列了其他7位助理人员的名单，他们是龚普生、安东、陈翊、浦山、周砚、孙慰、王乃静。

当时，美国采取了一种半推半让的态度。一方面，并不断然拒绝中国参加联大，另一方面却又不肯让中国顺顺当地进去。因此，美国代表企图将中国代表的权限限制在讨论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朝鲜战争的“特别报告”范围内，以逃避中国代表就台湾问题对美国的控诉。针对美国的这一阴谋，周恩来外长11月11日复电安理会，要求将中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同美国侵略朝鲜问题合并讨论，中国代表也将同时就这两个问题发言，不然中国将不接受安理会11月8日发出的邀请。周外长还严正声明，中国不承认侵略美军的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提出的所谓“特别报告”是非法的，其内容是别有用心和片面的。这使美国的阴谋又一次宣告破产。

为了使此行获胜，周总理指示代表团，在联大的主要发言要在国内写好和审定，各种资料也都要整理好并译成外文；到联大后的具体活动，可由代表团相机行事。

11月14日，伍修权率团离京，途经莫斯科、布拉格、伦敦，于24日抵纽约，受到各方面人士的欢迎。27日代表团首次来到成功湖畔，出席了联合国政治委员会的会议，记者们蜂拥而上。第二天下午，安理会开始讨论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在这次会上，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约2万字的长篇演说，讲了近2个小时。演说结束后，许多人